

# 澳門崗頂山坡出土陶瓷研究

盧泰康\*

1994年澳門崗頂山坡的龍嵩街附近，發現了大量明清瓷器破片，這些標本被採集後捐贈給博物館，成為澳門博物館藏品中具體反映“大航海時代”中葡貿易的重要收藏。透過本研究分析探討可知，陶瓷遺物可被區分為三個時期，全面地呈現澳門陶瓷貿易的變遷歷程，揭示了澳門是中國陶瓷大規模輸出地的史實。此外，其亦可被置於西方教會社群的貿易瓷流通網絡中，藉以探索東西文明交匯的澳門與世界各地物質文化交流的真實面貌。

## 前言

1994年澳門崗頂前地(Largo de Santo Agostinho)下方山坡一側的龍嵩街(Rua Central)附近，緊鄰聖奧斯定教堂所屬花園護土牆的山坡地盤崩塌，時至1995年7月中旬，澳門當局針對該崩塌地段進行清理，並着手龍嵩街凱旋門廣場的建築工程。當時有澳門本地市民潘國雄、趙維富、鄧貴文、梁教智、許永秀五位文物愛好者，在崩塌地點發現大量明清瓷器破片。他們熱心而持續地在工地所挖出的土方內搜尋，最後共收集了三千餘片標本，隨後捐贈給澳門博物館(澳門日報編輯部，1996；澳門雜誌編輯部，1997：6-11)。而這批文物也成為澳門博物館中具體反映“大航海時代”中葡貿易歷程的重要收藏，同時也揭示了澳門是中國陶瓷大規模輸出地點的史實。

有關澳門龍嵩街出土陶瓷的討論與介紹，歷來已有多次報導，如宋良璧與鄭炳權(1999：77-80)、馬錦強(2010：143-162)、薛啟善(2010：83-85)皆曾撰文介紹此批標本。劉朝輝則是針對部分仍保留在採集者處的龍嵩街標本，進行分析與討論(2010：14-32)。2010年7月下旬，在澳門博物館

陳迎憲館長與研究員薛啟善先生熱情的協助與安排下，筆者帶領兩位研究生，會同日本陶瓷史學者野上建紀博士、佐佐木達夫教授夫婦等人，針對澳門博物館收藏的崗頂山坡龍嵩街出土陶瓷標本，進行詳細的檢視與分類，並挑選其中具有代表性者，逐一拍攝文物影像以及測繪標本線圖。

以下即針對澳門崗頂龍嵩街出土陶瓷遺物的類型特徵、年代、重要性及其所反映之價值，進行分析與考證。

## 出土陶瓷年代與類型

澳門崗頂龍嵩街出土的陶瓷，大體可分成三個時期，分別為16世紀後半葉至17世紀前半葉、17世紀後半葉、18世紀至19世紀。而依其釉色、胎質、產地等諸項特徵，又可分為中國燒製的青花瓷、白瓷、青瓷、彩瓷、安平壺、高溫硬陶，以及其它非中國製陶瓷器共七種。以下分述各時期所見陶瓷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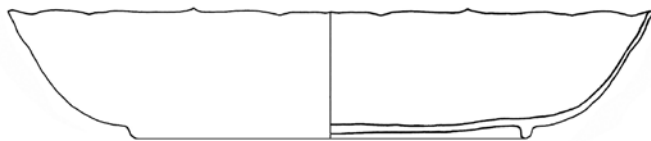
一、第一期：16世紀後半葉至17世紀前半葉

1. 青花瓷：數量最多，依其產地差異，可分為江西景德鎮窑與福建漳州窑兩類。

\* 盧泰康，臺灣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從事陶瓷史、歷史考古學、古器物學研究，現為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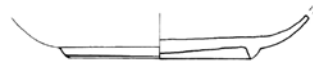
1.SA95-053 no. 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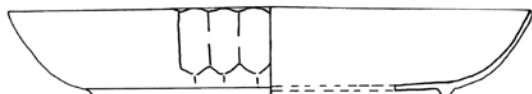
2.SA95-029 no. 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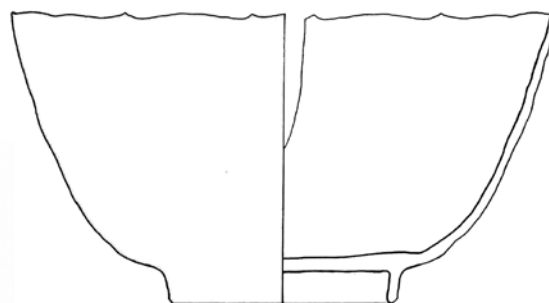
3.SA95-570



4.SA95暫編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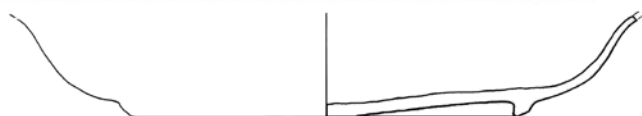
5.SA95-454 no. 1066



8.SA95-108 no. 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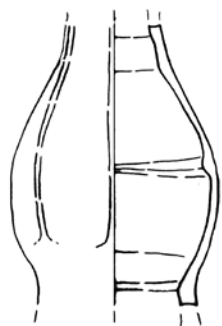
6.SA95-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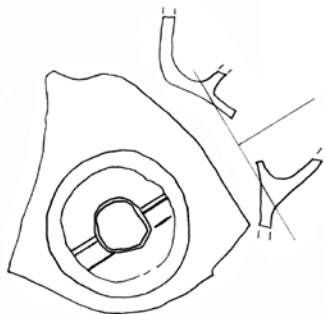
7.SA95-056



9.SA95 暫編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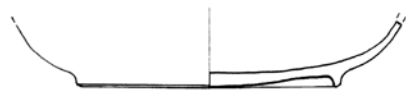
10.SA95-092 no. 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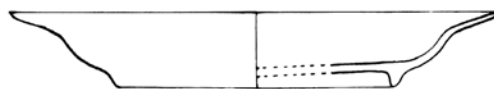
11.SA95暫編10



12.SA95暫編34



13.SA95-382



14.SA95-555



15.SA95暫編01



16.SA95-193





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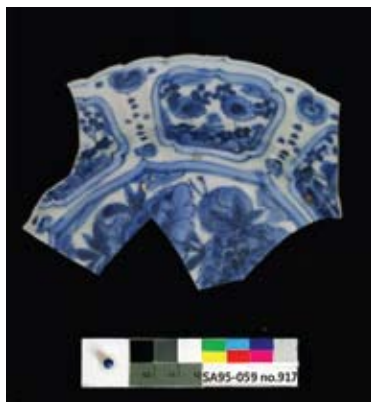


圖2



圖3



圖4

(1) 江西景德鎮窑青花

與紋飾特徵，又可區分成克拉克風格與非克拉克風格兩種類型：

A. 克拉克風格 (Kraak

Porcelain) 青

花瓷有盤、碗、瓶、罐、盒、軍持共六種器形。

a. 盤：克拉克風格青花盤依其特徵可分為六型：

第一型：花口、折沿、弧壁，器身有模印開光起伏，圈足切修細緻（線圖1）。胎質潔白，青花發色濃豔。具有代表性紋飾者，以標本SA95 no. 911為例（圖1），盤心繪奇木支座盆花，外圍以八組錦地如意紋，口沿與內壁以雙線勾繪八組開光花草紋，間以錦地綴珠飾板。同類克拉克青花盤可見於1600年沉沒於南大西洋聖赫勒拿島的白獅號 (Witte Leeuw) 沉船 (Pijl-Ketel, 1982: 61) 以及發現於馬來西亞海域1625年左右的萬曆沉船 (Sjostrand & Idrus, 2007: 204)。至於傳世收藏則可見於葡萄牙里斯本 Santos 博物館 (Rinaldi, 1989: 105)、土耳其 Topkapi Saray 博物館 (Krahl, 1986:

771)，其年代被歸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標本SA95-059 no. 917（圖2），盤心繪花卉紋，口沿內壁繪開光花草紋，間以如意雲頭綴珠紋，外壁簡單勾繪八組珠飾開光。

第二型：花口、折沿、弧壁，器身無印模起伏，圈足切修細緻。胎質潔白，青花發色濃豔。具有代表性者，以標本SA95-017 no. 888青花盤為例（圖3），盤心繪冰裂瓶花紋，外圍飾以八組錦地如意紋，口沿與內壁勾繪雙線八組開光花草紋，間以綴珠紋飾板。此類造型紋飾之青花瓷盤，可見於法國巴黎的 Institute Neerlandais (Rinaldi, 1989: 90)，其年代被定為1575-1600左右。標本SA95-016 no. 887青花盤（圖4），盤心繪瑞鹿紋，口沿與內壁勾繪雙線開光花草紋。同型青花盤可見於1600年沉沒於馬尼拉的西班牙 San Diego 沉船 (Desroches, Casal and Goddio, 1996: 315)，以及1606年沉沒於葡萄牙 Lisbon 外 Tagus 河口的 Nau (貨船) Nossa Senhora dos Mártires 號 (Pepper Wreck) 之出水瓷器 (Castro, 2005: 63)。

第三型：折沿、弧壁，胎質潔白，青花發色良好，盤心多繪瑞鹿紋，口沿與內壁以單線勾繪開光花草紋（圖5、線圖3、線圖4）。筆者曾針對本型青花盤進行分析討論，確認此類盤心裝飾鹿紋之青花瓷，亦有折沿無開光的類型；兩種鹿紋盤常見共出於17世紀前半的沉船與陸上遺址（盧泰康，2006：42-43）。



圖5



圖7

第四型：花式口沿，直口外敞，弧壁，以標本 SA95-029 no. 893 為例，內外壁皆繪開光紋，盤心勾繪湖石花鳥紋（圖6、線圖2）

第五型：標本多殘缺，僅存口沿或盤心，內壁多繪圓形或桃形開光，內填八寶、花草紋，開光之間以捲草紋相連（圖7）。



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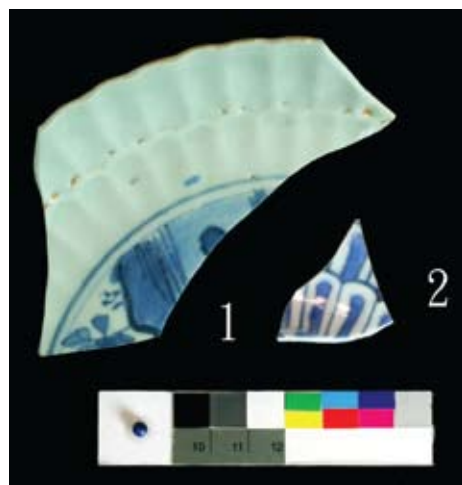


圖8

第六型：花口、弧壁，器壁有青花勾繪或模印之菊瓣紋裝飾（圖8、線圖5），類似器物見於 Groninger 博物館 (Rinaldi, 1989 : 117)，以及土耳其 Topkapi Saray 博物館 (Krahl, 1986 : 712)，前者年代被判定為1615-1625年，而後者年代則被斷為16世紀末。

另有許多口沿與器壁已殘缺，無法辨識造形之標本，但可確定為拉克風格開光青花瓷，盤心邊緣圍以花形錦地紋，器內可見多種母題裝飾，較具有代表性者如禽鳥紋、花草昆蟲、水牛紋、盆花瑞菊紋等（圖9）。另有標本SA95-587，盤心可見 Hydra（九頭蛇）盾徽（圖10、線圖6），所屬年代約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具有相同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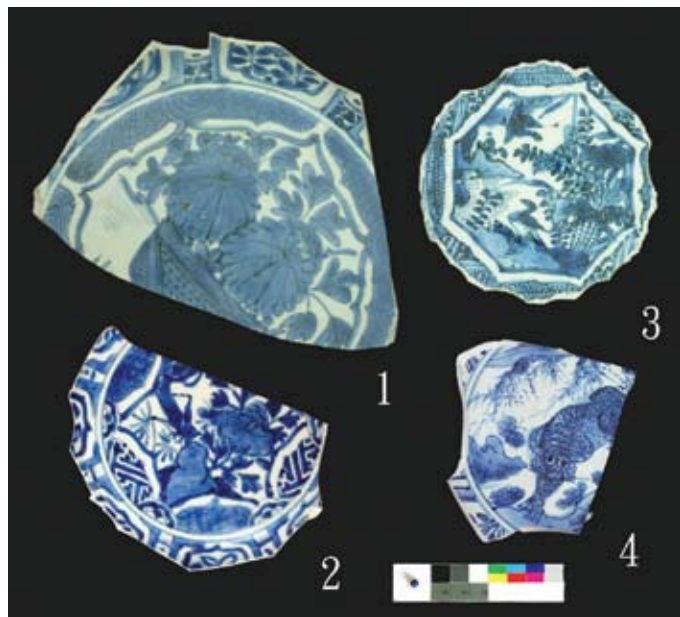


圖9



圖10

飾的完整青花碗、盤，可見於葡萄牙 Santos 宮殿（附圖1, Lion-Goldschmidt, 1984: 44）、美國 Peabody Essex 博物館（Canepa, 2009: 75），以及倫敦大英博物館等傳世收藏（Harrison-Hall, 2001: 300-301）。

b. 碗：依其各項特徵與尺寸可分為三型：

第一型“大碗”：花口，器壁直弧，復原後



圖11



圖12

可知器高約在11至12公分左右，器身有模印開光起伏，圈足高直且切修細緻。內外壁皆以雙線勾繪花形開光花草、湖石或瑞獸紋，如標本SA95-112 no. 945、SA95 no. 946（圖11、圖12、線圖8）。

第二型“小碗”：以其紋飾特徵又可分為三式：

二型I式小碗：花口，模印花棱式器壁，開光內繪天馬波濤紋，開光之間裝飾垂珠墜飾，如標本SA95 no. 904（圖13）。相同青花碗可見於土耳其 Topkapi Saray 博物館收藏，年代被定為1575-1600年左右（Rinaldi, 1986: 149）。

二型II式小碗：器壁內外皆飾以開光，而外壁與碗心開光內重複出現瑞鹿紋，如標本 SA95-929 no. 1058（圖14）。



圖13



圖14



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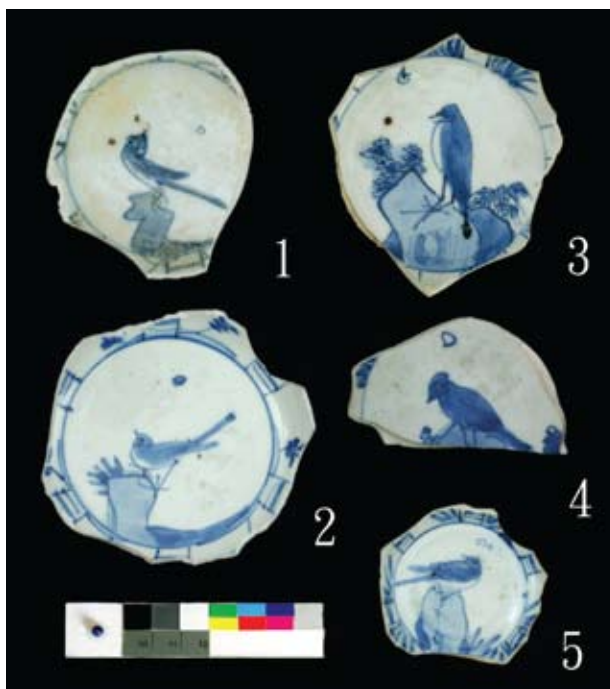


圖16

二型III式小碗：花口，弧壁，器壁內、外裝飾開光花草紋，如標本 SA95 no. 939 (圖15)，碗心則大多繪有湖石禽鳥紋 (圖16、線圖9)。龍嵩街出土本式青花小碗中，以標本 SA59-116 no. 949 最為特殊 (圖17)，屬於時代風格較早的“初期”克拉克瓷。該碗器壁內、外之青花紋飾，雖已運用了“單線分隔”的克拉克瓷裝飾手法，但其花草湖石之勾繪，卻跨越開光之外，甚至重疊覆蓋隔線，顯示典型“開光”裝飾分割紋飾母題的概念，尚未發展成熟。目前考古出土資料中此類早期

克拉克瓷的案例不多，目前僅見美國加州海岸西班牙 San Felipe 號沉船中發現的幾件鳳紋青花碗，該地學者考證該船所屬年代應在1576年 (Porten, 2001: 57-61; Porten, 2009)。至於現存流傳於世的完整器收藏，見於土耳其 Topkapi Saray 博物館藏品 (附圖2, Krahl, 1986: 745)。



圖17



附圖2：早期克拉克風格青花碗 Topkapi Saray 博物館藏  
(引自 Krahl, 1986: 745)

第三型“克勿申碗 (Klapmut)”：折沿、深弧壁，非中國傳統器形，乃為因應西方飲食習慣所生產之外銷瓷碗。本批瓷器所見多為折沿（標本 SA95-102 no.935）與碗心（標本SA95 暫編41）殘片（圖18）。

c. 瓶：依造形可分為兩型：

第一型“葫蘆瓶”：標本 SA95-092 no. 926，僅存上半部殘件（圖19、線圖10），外壁開光紋內，飾以博古几案與花草紋交錯出現，內壁可見接坯痕。

第二型“長頸瓶”：僅存唇口、細頸與肩部殘片，外壁為錦地開光紋（圖20）。

d. 罐：僅存器底殘片，標本 SA95-119。

e. 盒：長方形蓋盒，僅存蓋面殘片，標本 SA95-090 no. 925。

f. 軍持 (Kendi)：皆為殘片，標本SA95暫編10 為肩部殘片，器身與流嘴接合處有內壁之流水孔（圖21-3、線圖11）。標本SA95暫編34為圓乳形流嘴殘片（圖21-2、線圖12）。標本SA95暫編06應為象形軍持之頭部殘片，器表以青花勾繪眼部（圖21-1）。



圖18



圖19



圖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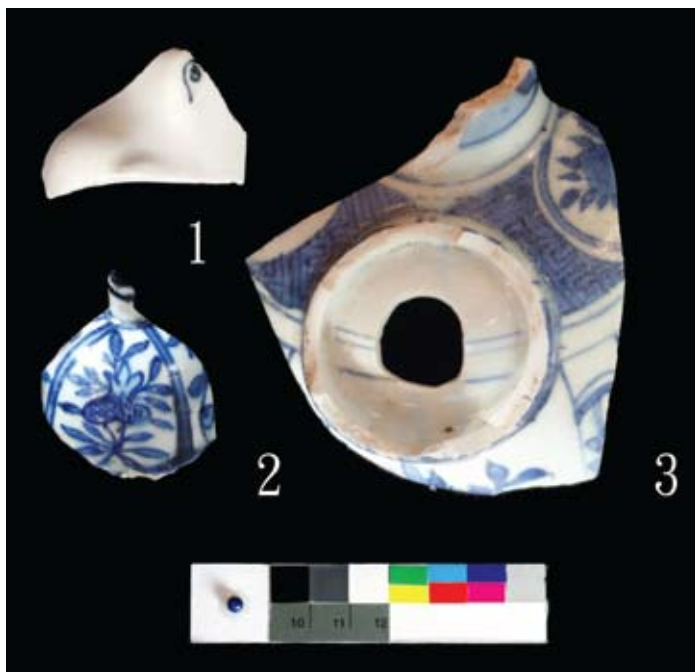


圖21



圖22

a. 盤：依其器形與類型可分為六型。

第一型“折沿盤”：折沿，弧壁，部分為花式口沿（線圖14）。本

B. 非克拉克風格瓷：本類標本有盤、碗、盒、注壺、器蓋共五種器形。其中碗、盤器底所見款文，包括“大明成化年製”、“大明宣德年製”、“宣器”、“長春佳器”、“天祿富貴佳器”、“雅”、“天啟五年承造”、“方框印章”等。

型盤之紋飾內容多樣，以標本SA95-037 no. 900為例（圖22），盤心繪山水亭臺紋，口沿勾繪蒼鷺水草紋。同類青花盤可見於葡萄牙里斯本Anastácio Gonçalves 博物館，年代被定為16世紀後半期 (Desroches, Matos and Museum of Anastácio Gonçalves, 1996: 89)。盤心裝飾鳥類題材者，包





圖23



圖24



圖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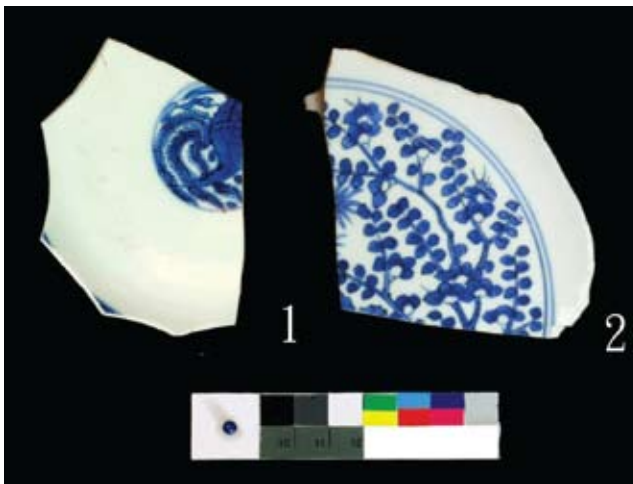


圖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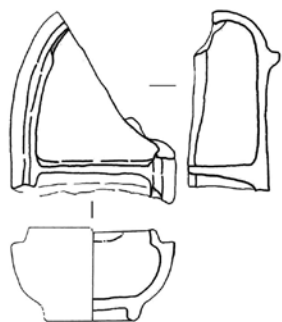
含瑞鶴、蓮池雁鴨、立鳳紋等(圖23)。另有水草游魚、瑞鹿紋、團花紋等各式內容(圖24、線圖15)。

第二型“直口盤”：直口，弧壁，如標本SA95-049 no.908，盤心為山水樓閣紋，內壁繪纏枝番蓮花紋(圖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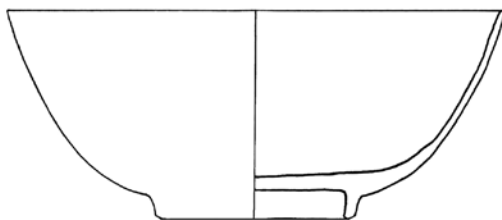
第三型“撇口盤”：撇口，弧壁，尺寸較小，如標本SA95-097 no.931、SA95-424 no.1056(圖25-2、圖25-3)。

第四型“口沿不明盤”：部分標本因殘破而無法確認其口沿特徵，但其中頗有品質極佳者，青花發色濃艷，胎質潔白，圈足切修細緻，器底書寫年號款，水準可堪比擬明官窑瓷器。以標本SA95-382為例(圖26-1、圖27、線圖13)，盤心圓形開光，內以細筆勾繪飛鳳紋，器底青花雙圈，內書“天啟五年承造”(1625)六字二行款，屬罕見的明末紀年款青花瓷。標本SA95-193盤心繪折枝花草，器底青花雙圈，殘存“年製”兩字(圖26-2、線圖16)

第五型“刻花青花盤”：屬精細高級之景德鎮窑類型，胎質潔白，圈足切修細緻，盤緣或盤心殘存小面積青花裝飾。編號SA95-175標本，盤內以淺浮雕刻劃花草



17.SA95暫編11



18.SA95-098 no. 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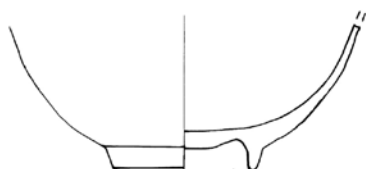
19.SA95-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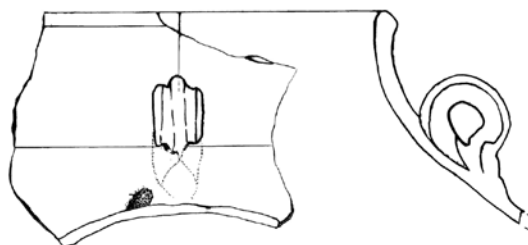
21.SA95-376



20.SA95-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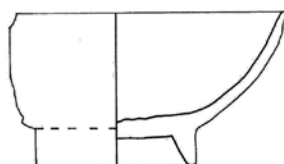
22.SA95暫編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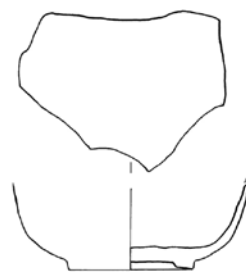
23.SA95-269 no. 1011



24.SA95-261 no. 1003



25.SA95-262 no. 1004



28.SA95-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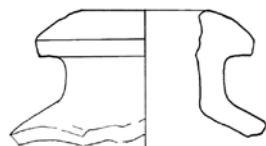
26.SA95-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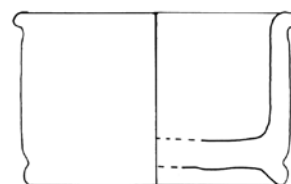
27.SA95暫編16



29.SA95-154



30.SA95-247 no. 994



31.SA95-552





圖27



圖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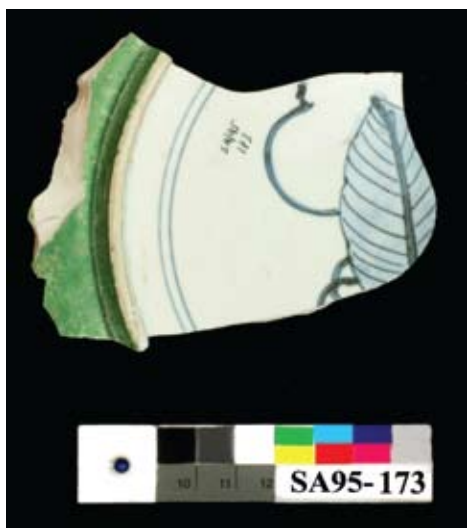


圖29



圖30

紋(圖28-1);標本 SA95-171 盤內則以針刻細線花草紋裝飾(圖28-2)。

第六型“綠釉青花盤”：編號SA95-173標本(圖29)，盤內與外壁施低溫綠釉，外底圈足內則以青花雙圈內勾繪大葉藤草紋，屬罕見之景德鎮窑產品，目前幾乎未發現相同的傳世品或考古出土案例。

b. 碗：紋飾題材類型繁多，反映晚明嘉靖、萬曆兩朝以降，景德鎮民窑產品之多樣性特色，例如纏枝花草紋(線圖18)、瑞獅綬帶紋、天官瑞鹿、麒麟紋、人物壽字紋、大明年號款文字等等，其中幾種類型(圖30-2、圖30-5、圖30-6)，曾同時被發現於17世紀前半葉萬曆號沉船(Sjostrand and Idrus, 2007: 108, 120 and 136)。

c. 盒：可分為銀錠形、長橢圓形兩種型式(圖31、線圖17)。

d. 注壺：多見細長的流嘴殘件，表面有青花裝飾(圖32)。

e. 器蓋：如編號SA95暫編31標本，器頂原應帶鈕，蓋面勾繪四爪行龍紋(圖33)。

(2) 福建漳州窑青花瓷：數量甚為稀少，器形以盤、碗為主(圖34-2、圖34-3、線圖21、線圖22)。另有少量罐形器(圖34-1)。本類瓷器的品質較差，青花發色灰暗，圈足切修粗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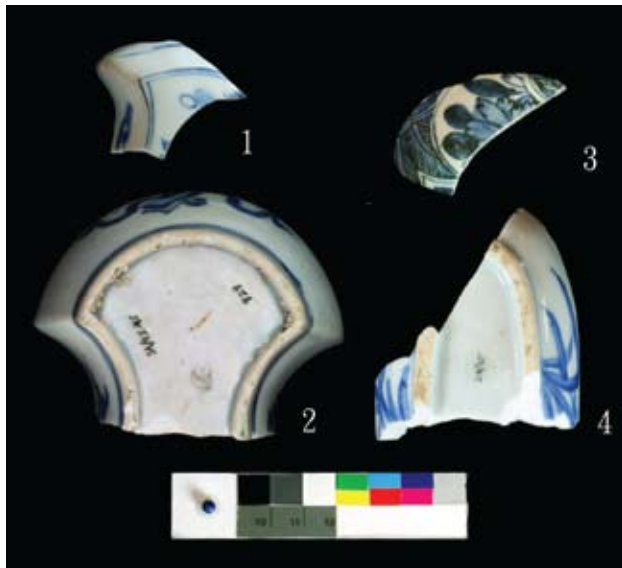


圖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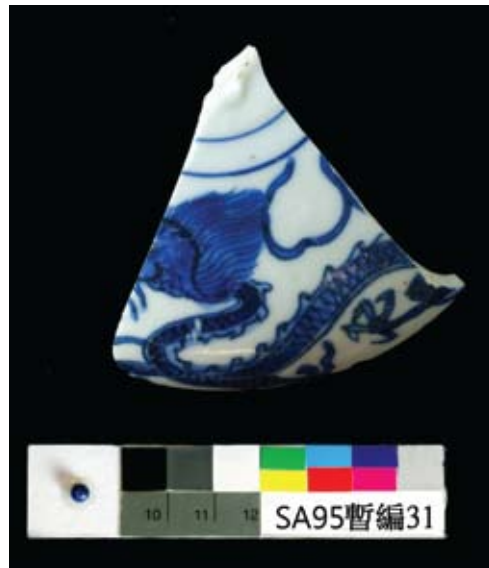


圖33



圖32



圖34



圖35



附圖3；萬曆沉船出水白瓷墊餅  
(引自 Sjostrand and Idrus, 2007: 37)

2. 白瓷：數量甚稀，多屬景德鎮窑產品，如標本SA95-460菊花式白瓷盤，器身模印菊瓣裝飾。另一相當特殊的白瓷標本，編號SA95-543（圖35），應屬燒造窑具之“墊餅”，為瓷器燒成時



圖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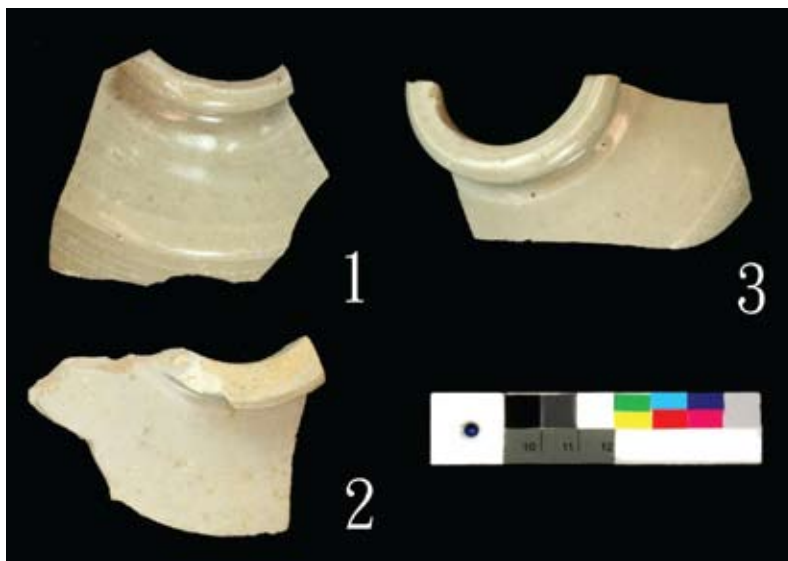


圖37

墊於碗盤之下，以防止產品沾黏匣鉢之圓形瓷質墊具，燒成後會被敲落丟棄，並非貿易商品，故歷來僅發現於江西景德鎮窑址。而本件遺物發現於澳門，研判其可能是在產地大量輸出瓷器時，因考量產品燒成出窑後需將瓷器快速捆紮運出，

以節省裝貨時間，或是避免敲落“墊餅”時傷及瓷器，導致交易利潤降低，故仍有墊餅沾黏於瓷器底部，被一併包裝運送出口。目前海外地區所發現的“白瓷墊餅”，僅有少數考古出土案例，見於馬來西亞所打撈之萬曆沉船遺物（附圖3；Sjostrand and Idrus, 2007: 37），以及日本長崎萬才町高島邸遺跡（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1996: 100）。

3. 青瓷：盤形器，如標本SA95-296、SA95暫編24（圖36、線圖20），應屬福建漳州窑產品，胎骨斷面呈灰色，圈足粗寬，盤心裝飾細線刻花，再施以青瓷釉。同類青瓷盤可見於1643年左右沉沒於南中國海的Hatcher號沉船（Sheaf and Kilburn, 1988: pl. 114），以及荷蘭Het Prinsessehof博物館傳世收藏（Harrison, 1979: 16, 18）。早在中國宋元時期，以浙江龍泉窑為代表的青瓷器，已大量行銷海外地區，是最受歡迎的中國陶瓷商品。到了明代晚期，中國陶瓷產業大多早已轉向青花瓷生產，但海外仍有青瓷市場需求，因此福建漳州一帶窑場，仍然生產一定數量的青瓷，用以對外輸出。

4. 青灰釉罐（安平壺）：崗頂山坡採集的陶瓷中，可見三件青灰釉罐標本（圖37），本類瓷罐在臺灣臺南安平地區出土數量頗大，故有“安平壺”之別稱，應為福建北部邵武地區所燒造（傅宋良、王上，1988：19-22），常被發現於世界各地的17世紀沉船或陸上遺址。



圖38



附圖 4: San Diego 沉船出水貼花釉陶罐  
(引自 Desroches, Casal and Goddio, 1996: 245)

#### 5. 高溫硬陶：

(1) 貼花釉陶罐 (Tradescant storage jar)：肩部帶繫，器身有纏枝蕃蓮花貼花裝飾，經高溫素燒後，全器再施以低溫黃色與綠色釉二次燒成 (圖38、線圖23)。本類釉陶被日本學界稱之為“華南三彩陶”，應為閩南地區燒造，福建晉江磁灶窑址曾發現類似遺物(何振良、林德民，2002：圖90)。而此類陶罐具有裝盛貨物的實用性，且呈現東方陶瓷之特色，故相當受歡迎。在17世紀前半葉傳入西方後，因其收藏者之名，被賦予了“Tradescant jar”這樣的特定名稱(西田宏子，1993：304；Brigadier, 2002: 112-114)，相同陶罐常常被發現於16至17世紀前半葉的西方沉船遺物中，例見菲律賓巴拉望省(Palawan) 西部海域 Royal Captain 險礁打撈之16世紀沉船 (Goddio, 1988:103-107)、1600年San Diego 沉船 (附圖4)、1606年 Nau Nossa Senhora dos Mártires 沉船 (Castro, 2005: 103)，以及1625年左右的萬曆沉船等等(Sjostrand and Idrus, 2007: 258)。



圖39

(2)釉陶碗：依器形可分為敞口斜壁（標本SA95-261 no.1003，圖39-1、線圖24）與斂口弧壁（標本SA95-262 no.1004、SA95-266，圖39-2、線圖25、線圖26）兩種。胎色灰黃，施

雜色灰釉，圈足粗寬，碗心澀底無釉。本類粗碗可能為廣東一帶本地窑場所製作，同類粗質釉陶碗，亦曾被發現於萬曆沉船中（Sjostrand and Idrus, 2007: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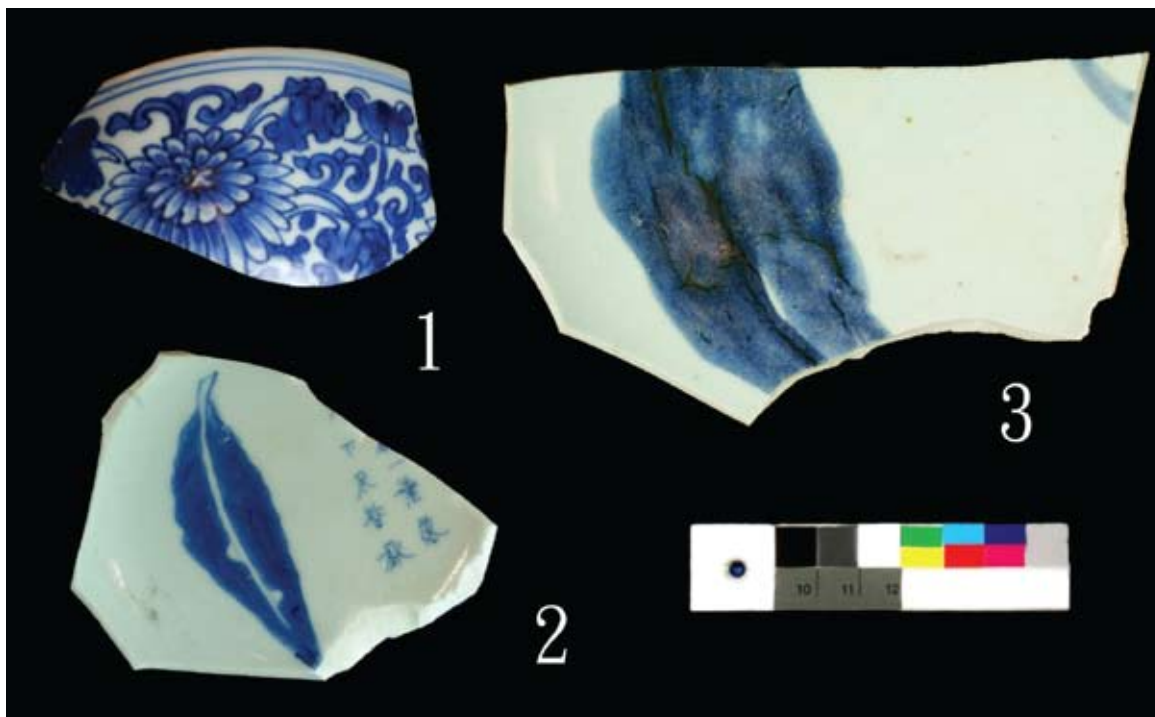


圖40





圖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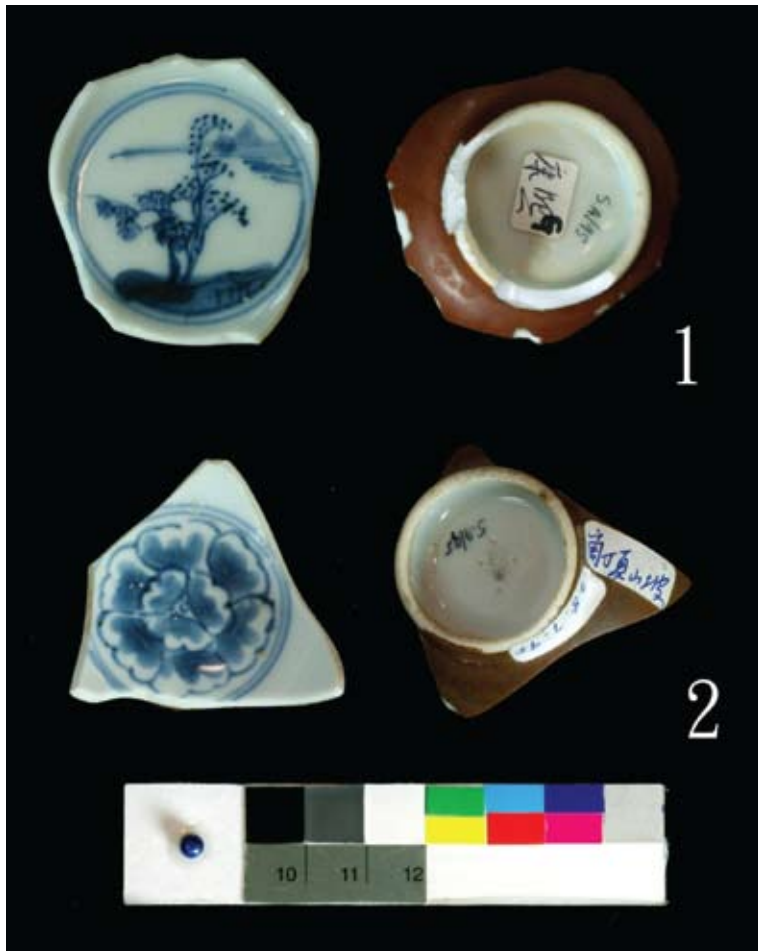


圖42

二、第二期：17世紀後半葉所見數量遠少於第一期，類型仍以青花瓷為主，依其器型，可分成盤、碗、杯、罐等數種。

1. 盤：典型器以秋葉紋青花盤為代表（圖40-2、40-3），如標本SA95-445 no.1063，盤心繪一長葉，右側書寫“（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皆秋”。同類青花盤可見於1690年左右沉沒於越南中部海域的 Vung Tau 沉船（Jörg and Flecker, 2001: 80），以及1697年失事於東非 Mombasa 海域的葡萄牙 Santo Antonio de Tanna 沉船（Sassoon, 1981: 103）。

2. 碗：以纏枝團菊紋碗為代表，以標本SA95-161為例（圖40-1），亦可見於上文所引17世紀晚期 Vung Tau 沉船（Jörg and Flecker, 2001: 81）遺物。另有青花碗底書寫典型清初款文者，如“大清康熙年製”、“玉堂雅製”堂號款器（圖41）。

3. 杯：依釉色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青花瓷杯，器心繪簡筆山水人物，足底切修壁式足（線圖28）。

第二類以醬釉青花小杯為代表（圖42、線圖27），外壁施醬釉，杯心以青花勾繪團花紋或簡筆山水紋，類似器可見於福建平潭碗礁一號出水清初瓷器（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2006: 209）。具有醬釉青花裝飾的碗、杯，在18世紀中期仍甚為流行。

4. 青花罐：外壁裝飾繁密的纏枝花草紋（圖43）。



圖43



圖45



圖44

### 三、第三期：18世紀至19世紀

數量亦少，以景德鎮窑產品為主。類型包含青花、青釉白瓷、彩瓷等。

#### 1. 青花瓷：器形包含盤、直筒杯、盆、器蓋等。

(1) 盤：典型器如山水樓閣紋青花盤，如標本 SA95-038、SA95-221 no.979 (圖44-2、圖44-3)，為清代中後期常見的外銷西方貿易瓷，同類型器可見於1816年失事沉沒於馬來西亞海域的 Diana 號沉船 (Christie's Amsterdam, 1995: 45)。另有梵文青花盤 (標本SA95暫編25，圖44-1)，亦屬18至19世紀代表性的瓷器。相同考古出土案例，可

見於江西萬安出土“乾隆乙巳年”紀年墓 (余家棟, 1997: 圖224)，以及1830年左右失事的 Desaru 沉船 (Brown and Sjostrand, 2001: color pl. 93)。此外，尚可見一些圈足切修特殊之青花大盤，如標本 SA95-154，足心帶有弧狀凹槽 (線圖29)。

(2) 直筒杯：直口，杯身呈直筒狀，器身裝飾山水樓閣紋，如標本 SA95-235 (圖45-1)，亦屬典型清代輸出西方之外銷瓷，考古出土相同案例，可見於1816年 Diana 號沉船 (Christie's Amsterdam, 1995: 51)。標本 SA95-094 no.928 應為本類青花杯之器柄 (圖45-2)。



圖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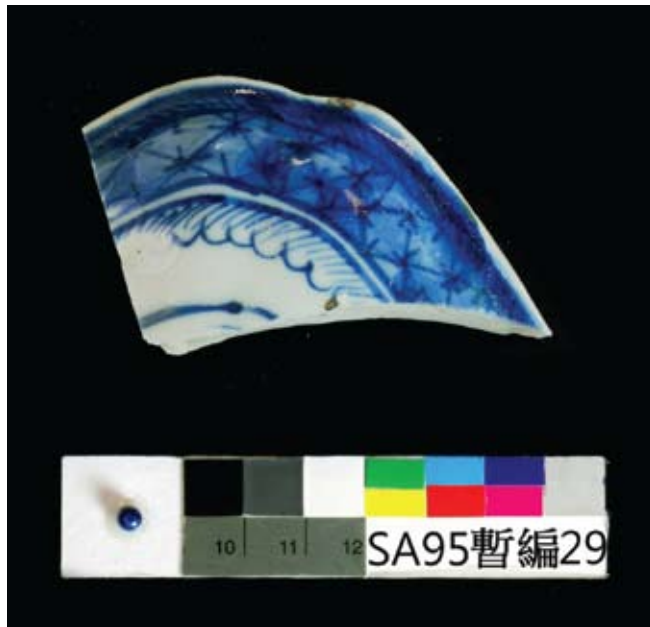


圖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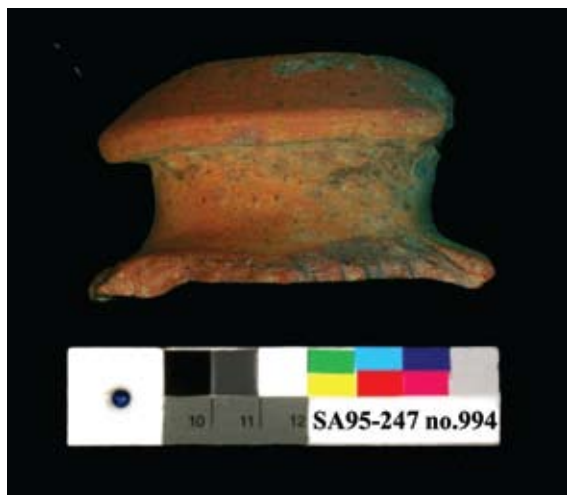


圖48

(3) 盆：敞口，器身裝飾花草紋，如標本SA95-134 (圖46)。

(4) 器蓋：屬西洋餐具“湯盆”(soup tureen)之器蓋，為清代銷售至西方市場之器類，如標本SA95 暫編29 (圖47)。

2. 青釉白瓷：外壁施青瓷釉，內壁為透明釉白瓷，器形有碗 (標本SA95-325) 與杯 (標本SA95-581) 兩種。

3. 彩瓷：以碗形器為主，器身裝飾低溫色釉花草紋，如標本SA95-151、SA95暫編27。

#### 四、非中國製陶瓷

澳門崗頂龍嵩街出土非中國產陶瓷，所屬年代跨越16至19世紀，來源包含歐洲、日本等地產品，其中有關17世紀後半葉日本肥前瓷器的部分，將由野上建紀博士以專文進行討論，在此不多作贅述。以下分述歐洲類陶瓷遺物：

1. 橄欖罐(Olive jar)：標本SA95-247 no.994 (圖48，線圖30)。小口厚唇，唇口斷面呈半三角形，胎色橙紅，外壁無釉，內壁施黃褐色釉。本類陶罐屬典型西班牙陶器，普遍見於西班牙殖民地或其所屬沉船遺物，一般通稱為 Olive jar 或botijas peruleras，用來裝盛橄欖油、酒或醋等液體 (Marken, 1994: 45-49)。根據本類陶器的研究分類與編年成果可知 (Ibid: 129-138)，龍嵩街出土橄欖罐的唇口特徵，顯示其年代應在16世紀晚期至17世紀初左右。而日本長崎立山地區出土遺物中，亦曾發現此類完整的橄欖罐 (附圖5；川口洋平，2007：47)。

2. 錫白釉罐：又稱為馬約利卡 (Majolica) 錫釉陶，標本SA95-552 (圖49、線圖31)，器形特



圖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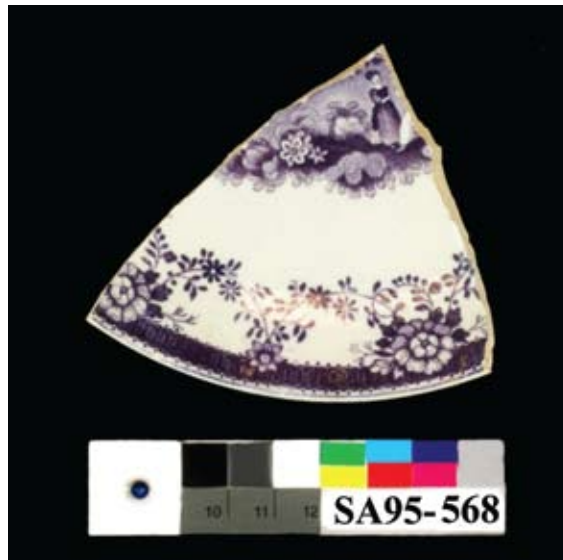


圖51



圖50

徵為大口外撇，束頸，直壁，撇足，器表錫白釉大面積剝落。本類陶罐多被西方人拿來做為醫療用的膏藥罐 (Albarelo)。目前這類遺物在亞洲考古遺址所出土者，多被發現於歐洲人活動地點，例如日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所發現的相同錫白釉

罐，被判定為17世紀中期尼德蘭或英國所燒製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90、103)，臺灣安平熱蘭遮城出土的錫白釉藍彩罐殘片，則屬17世紀前半葉荷蘭人佔領時期遺存 (謝明良，2006：86-95)。另在1613年荷蘭VOC白獅號沉船上所打撈的同型陶罐，器身施以單一褐色釉 (Pijl-Ketel, 1982: 249)。

3. 小口折肩瓶：依造形與釉色差異可分為兩型。根據陶瓷史學者針對臺灣出土此類陶罐的研究成果可知，其功能可能為“墨水瓶”，屬19世紀英國所燒製 (謝明良，2007：80-84)。

第一型：標本SA95-521 no.1073 (圖50-1)，小口外撇，束頸，折肩，直壁，平底，胎色黃褐，器身施黃褐釉。

第二型：小口帶流，細頸較長，近口處有一突棱，折肩，直壁，平底，白胎，器身施透明釉，如標本 SA95-545、SA95-550 (圖50-2、50-3)。

4. 藍彩西洋風景人物盤：屬19世紀歐州地區燒造的陶瓷，盤內裝飾銅版轉印釉彩，釉色紫藍，器身施白釉，如標本SA95-568 (圖51)。

## 完整反映澳門陶瓷貿易歷程

崗頂山坡龍嵩街出土的各類陶瓷標本，全面地反映了澳門各時期陶瓷貿易與變遷歷程。經過本研究分期與類型比對，可將標本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分別是16世紀後半葉至17世紀前半葉、17世紀後半葉，以及18世紀至19世紀。

第一期所見標本數量最多，品質最精，所屬年代直接對應了葡萄牙在澳門貿易的黃金時期，時間從16世紀50年代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延續至17世紀中期左右。本期以江西景德鎮民窑所燒造的高品質瓷器佔絕大多數，而專門用於外銷的克拉克風格瓷器，器形包含了盤、碗、瓶、罐、盒、軍持等多種類型，部分尺寸碩大的碗、盤，保存堪稱完整，經過拼對修復後，可完整呈現其原來面貌。而克拉克瓷紋飾的種類，也相當多樣繁複，其中尚發現了時代風格較早，罕見於考古資料的早期克拉克瓷實物。筆者曾經討論“克拉克風格”瓷器開始出現的時間，應在1560至1570年代中期的十餘年間，也就是明世宗嘉靖末至神宗萬曆初年。這段時間正好是中國對海外貿易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是隆慶元年(1567)明朝



附圖5：日本長崎立山出土西班牙橄欖罐（引自川口洋平，2007：47）

政府在福建漳州的月港開放海禁，民間“准販東西二洋”（張燮：132-133），中國陶瓷的出口量與海外供貨需求大增。另一方面，1570年代由西班牙建立的“月港-馬尼拉”航線正式運作，使得中國陶瓷的銷售市場更隨之擴大，不僅透過大帆船航線拓展至太平洋彼岸的美洲，甚至經由大西洋航路輸往歐洲。至此，以江西景德鎮為首的中國陶瓷產業，就在瓷器銷售量提高的同時，也及時回應了海外消費市場的品味與需求，快速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之風格開光紋飾的新產品——克拉克瓷（盧泰康，2012）。而龍嵩街所出土的早期克拉克風格瓷碗（圖17），則證明在澳門從事對華貿易的葡萄牙人，同時亦已開始購買到此類新出現的中國瓷貨。

至於龍嵩街出土的非克拉克風格青花瓷，數量亦多，屬嘉靖朝至明末風格，其中甚至包含了少數胎釉潔白、圈足切修細緻、水準接近明代官窑的高品質瓷器，如“天啟五年承造”（1625）紀年盤、刻花青花盤等。

透過本次研究比對分析可知，不少龍嵩街出土標本可以對應世界各地所發現的水下沉船遺物、陸上遺址考古出土品，以及博物館傳世收藏。例如馬來西亞海域所發現的萬曆沉船（附圖6），所屬年代在1625年左右，與龍嵩街第一期陶瓷遺物大致相同，二者不僅皆可歸屬於葡萄牙海上貿易脈絡，且所發現瓷器亦有不少特徵相同者。另一值得特別關注的現象，是萬曆沉船、日本長崎、澳門龍嵩街出土陶瓷中，同樣皆發現了無商品價值的“瓷質墊餅窯具”，而三個案例皆與16世紀後半至葉17世紀前半的葡萄牙貿易有關，顯示葡萄牙人收購景德鎮瓷貨時，中國商人所採取的一種相當特殊的瓷器包裝販運模式。

此外，本期亦有來自福建的陶瓷產品，但出於地理位置、輸出管道與航運成本的差異，其數量遠少於江西景德鎮窑製品。儘管如此，所見陶瓷仍頗具特色，類型包含青花瓷、刻花青瓷、釉陶貼花罐、安平壺等，顯示當時澳門與福建之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貿易與互動。

第一期陶瓷遺物的年代下限約在17世紀中期左右，澳門因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逐漸失去了東西貿易的主導權。首先是1639年日本的鎖國政策，致使澳門對日航線關閉；繼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強力介入亞洲海上貿易，葡萄牙獨佔亞洲貿易的盛況不再。到了1641年，荷蘭人佔據葡屬麻六甲，掌握麻六甲海峽的海上貿易樞紐，遂使葡萄牙的東方貿易漸走下坡。

第二期約為1650年代後期至1684年之間，清朝政府在中國沿海各省持續實施嚴格的海禁與遷界政策，意圖斷絕沿海地區對明鄭勢力的接濟，此舉不僅扼殺了民間海外貿易活動，澳門亦受到嚴重的衝擊。雖然葡萄牙人透過多方努力，最後免於遷移內地或驅逐遣返之苦，貿易活動仍然大受影響(韋慶遠, 2002)。但透過龍嵩街出土的陶瓷實物顯示，具有一定數量的17世紀後半葉中國景德鎮瓷器，甚至是日本肥前貿易瓷被辨識出來，可見儘管當時海禁政策甚嚴，澳門仍然存在着陶瓷貿易活動。另一方面，史料中亦留下類似記錄，例如康熙六年(1667)兩廣總督盧興祖勒賄澳門弊案中，香山縣令姚啟聖從廣州裝船“帶了磁器賣與鬼子(指葡萄牙人)”，直接“借稱官貨

物買了磁器，出所禁之界，私到澳去要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95: 74-77; 湯開建, 1998: 73-85)，可知當時澳門確實存在着“違禁販運”的非法陶瓷貿易。

第三階段為18世紀至19世紀，此時的清朝政府已開放對外貿易，歐洲各國船隻可以直接航赴廣州貿易。而藉由龍嵩街出土陶瓷可知，仍有不少中國外銷瓷經由澳門輸出。此外，由於清朝政府不允許外國人士在季風船期之間滯留於內地的廣州城中，故澳門也成為了各國洋人暫留居住地(龍思泰, 1997: 47-50)。龍嵩街出土陶瓷中的英國小口折肩瓶、西洋藍彩盤，應該就是此時期西方人所留下的生活用器。當時的澳門因地之便，匯聚洋華各國人士，展現了中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國際風貌。

### 陶瓷遺物所屬文化脈絡

由於崗頂山坡龍嵩街出土陶瓷，並非正式考古發掘文物，缺乏詳細的出土現象與層位記錄，影響對遺物所屬歷史脈絡的判讀。儘管如此，透過對標本之時代與特徵的研究，並進行特定時空與地



附圖6: 萬曆沉船出水大量克拉克青花瓷(作者拍攝)

緣關係的分析，實有助於解讀此批文物的價值。

首先是根據採集者描述當時所見地層堆積之狀況：“表層以爛缸瓦、近代瓷器為多。中層基本上沒甚麼文物，下層夾雜了晚明至清初的瓷片、海砂、大型貝殼，有些貝殼大如拳頭，有蠔殼及海螺。”另有少量乾隆銅錢與日本寬永銅錢共出(澳門雜誌編輯部，1997：7-8)。因此當時猜測這批遺物為“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初期，在南灣港裝卸的瓷器損毀，被搬運工人扔下海中，後來崗頂平台填土，乃從海邊取砂，故而，這些碎片夾雜貝殼、海砂，被填在這裡”。(引同前註：8)但就本研究分析結果可知，龍嵩街出土陶瓷的年代上限為16世紀後半期，下限則在19世紀左右，延續時間長達數百年之久，而且同時包含了各類中國外銷陶瓷，以及非貿易所用之外來陶瓷。故本批遺物之屬性，可能無法單純被視為從海床上挖出來的“二次堆積”，應該也包含了該地點原本地層中未經擾動的遺物，也就是當時人類生活實際使用之遺存。另根據採集者回憶，該遺址所揭露之現象，甚至包含了疑似古井與墓葬遺跡：“古井有二十多呎深，古墓即在井底”，“井底有一口瓦缸，盛着二十多件直徑約八吋至十四吋的碗碟、骨殖”(引同前註：9)。亦暗示了崗頂山坡地段出土遺物，可能屬於特定人群在此地點長期從事多種性質活動的物質文化遺存。此外，在本研究所整理出土標本中，發現一件罕見的日本肥前青花瓷盤，器身有多處穿孔加工痕，應屬瓷器使用時不慎破損，經修補後持續被人使用之器(另見野上建紀博士專文介紹)，同樣清楚顯示此批文物並非單純貿易貨物的可能性。由於本地點所在崗頂山坡，即聖奧斯定教堂側花園護土牆，故應可在時空脈絡上，將澳門聖奧斯定教堂與天主教人群活動，納入出土陶瓷性質歸屬之考量。

有關天主教修道院出土中國外銷瓷之實例，目前已在海外發現不少地點，而其中屬於葡萄牙脈絡者，例見於印度果阿(Goa)聖奧斯丁(St. Augustinian)教會與修道院遺跡(1602-1835)，出土16世紀末至19世紀中國外銷瓷、日本肥前青

花瓷(佐々木花江，2010：253-258)。而在葡萄牙本土科因布拉市 Santa Clara-a-Velha 修道院所，亦發現了大量明代晚期瓷器，數量有將近五千片之多，其年代上限約在16世紀初，下限則在17世紀前半期(Santos, 2003: 24-31)，部分標本年代與澳門龍嵩街出土第一期陶瓷重疊。兩地所見同類紋飾的瓷器標本，包含鳳紋、山水紋以及克拉克風格青花盤。研究該批遺物的學者認為，Santa Clara-a-Velha 修道院出土的瓷器，有助於重建與探討葡萄牙天主教修院社群的生活，以及16世紀中國瓷器在歐洲餐飲生活的運用(Ibid: 30)。

至於葡萄牙或澳門所屬教會神職人員訂燒中國外銷瓷的實例，在傳世瓷器中則頗有所見，其中一類為葡萄牙傳世收藏的幾件17世紀青花瓷罐，罐身勾繪戴冠雙頭鷹形奧斯丁修會教團徽飾(附圖7)，而相同徽飾的浮雕石刻，可見於澳門民政總署大樓(市政廳)內收藏(Canepa, 2009: 72-74)。另一類是帶有“IHS”銘文者，以大英博物館收藏的17世紀初耶穌會紋章青花罐為例(附圖8)，器身菱花開光內勾繪“十字架與IHS”、“S”、“P”紋，顯示其為澳門耶穌會聖保羅學院所訂燒(Harrison-Hall, 2001: 379-380；西田弘子、出川哲朗，1997：9)。

澳門聖奧斯定會修道院(the Convent of St. Augustine)，葡文稱 Convento de St. Agostinho，又名龍鬆廟或龍嵩廟，清代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稱：“龍鬆廟者，在澳西北，初廟就圯，或覆之以葺，鬚鬆如髯龍，後廟鐘不擊自鳴，眾神之，恢崇其制，仍呼為龍鬆廟。”(印光任、張汝霖，1992：150)聖奧斯定會修道院設立的時間約在1580年代中期，由菲律賓奧斯丁會的西班牙宗教人員所創立，到了1589年，國王陛下命令上述西班牙人士返回馬尼拉，將修院移交給葡萄牙修士，並由果阿省長責令省特派員和修院院長 Pedro de S. Maria 神甫接管修院(金國平編譯，2005：248；龍思泰，1997：25-26；施白蒂，2005：23-25)。而崗頂山坡龍嵩街出土陶瓷中的數件標本，同樣反映了其與天主教會活動的關連性。例如標本 SA95 No.587 盤心之“Hydra”



附圖7：葡萄牙傳世收藏奧斯丁修會徽飾青花罐  
(引自 Canepa, 2009: 72)



附圖8：大英博物館藏耶穌會紋章青花罐  
(引自西田弘子、出川哲朗, 1997: 9)

盾徽，即為一重要實例。所謂 Hydra 為希臘古典神話中的九頭海蛇怪，頭被斬去後仍會生出。目前所見傳世的本類完整青花瓷盤心 Hydra 盾徽 (附圖1)，龍身帶翼，僅有七頭，其中五個獸形，兩個人形，盾徽兩側拉丁銘文捲軸為諺語“對智者來說天下沒有新鮮事”(Sapienti nihil novum)，所屬年代約在1575至1585年，應為荷蘭人介入中國貿易以前，葡萄牙贊助者在華訂燒之物 (Gray, 1960: 81-83)。而相當類似的題材，亦可見於16世紀末由耶穌會所創建，著名於世的澳門聖保羅教堂 (St. Paul) 正立面，其石刻浮雕 Hydra 紋同樣為七頭翼龍，中立頭像為猙獰的帶角人面，兩側各分三個鳥喙獸頭，獸頂有聖母立像，旁刻漢文“聖母踏龍頭”(附圖9)。這兩件題材相同，但細節略有差異的作品，同時出現於澳門天主教會所屬脈絡中，多少反映了可能出自葡萄牙教會訂製人的某些特殊意圖。

此外，龍嵩街出土的非中國陶器，可能也透露了教會所屬歐洲人的生活狀況，例如17世紀錫



附圖1 澳門出土陶瓷標本(澳門博物館提供標本，作者攝製)

白釉膏藥罐 (Albarelllo)，應是當時西洋人士從事醫療行為所使用之器。而西班牙橄欖罐 (Olive jar) 的發現，所揭示的訊息則更為重要，例如相同的西班牙陶罐，近年已被發現於日本長崎立山



地區，該地在鎖國前為基督教徒聚居、教會與墓地之所在。而所出土的西班牙橄欖罐，顯示其所裝盛之橄欖油，在日本被使用於宗教性用途的可能性，諸如基督教洗禮與喪葬等象徵性的儀式（川口洋平，2007：47-48），是故，此類陶罐成為反映長崎基督教時代文化特徵的關鍵遺物。至於鄰近立山南側的勝山遺址下層遺跡，即17世紀初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教會舊址，亦曾發現不少天主教金屬飾品、十字紋瓦。具體來說，日本長崎與西方天主教會的聯繫，正是透過澳門的葡萄牙海上航線所建立的。在1580-1640年間，葡萄牙與西班牙處於同一個國王統治下，史稱“聯合王室”時代，儘管澳門與馬尼拉在政治、宗教與貿易上存在着諸多衝突，但兩地之間關係密切卻是不爭的事實（塞亞布拉，2004：23-32）。另一方面，龍嵩街所出土的西班牙橄欖罐，也不禁讓人聯想起澳門聖奧斯定會修道院最早創立者，具有馬尼拉西班牙教會人士的身份背景，進而串連起日本長崎 - 澳門（葡萄牙東方航線） - 馬尼拉（西班牙東方航線）的多邊交流與大航海時代跨越各洋區的全球互動。



附圖9：澳門大三巴教堂正立面“聖母踏龍頭”石刻（作者拍攝）

## 結語

澳門博物館收藏的崗頂山坡龍嵩街出土各類陶瓷標本，具體反映明清時代中葡貿易的歷程，同時也顯示中國陶瓷透過澳門大規模輸出的重要史實。而根據本研究比對分期與類型分析可知，這些陶瓷遺物被區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全面地呈現澳門各時期陶瓷貿易的變遷歷程。此外，龍嵩街出土陶瓷的價值，亦可被置於以西方教會社群為主的中國貿易瓷流通網絡，藉以探索東方重要轉口地的澳門與大航海時代世界各地物質文化交流的真實面貌。

## 後記

在此衷心感謝澳門博物館陳迎憲館長與研究員薛啟善先生高瞻遠矚的學術眼光，極為重視澳門出土古陶瓷的文化與歷史價值，大力支持並慨允提供該館所藏標本，並同意筆者進行研究分析，同時也感謝館方人員陳志亮先生的多方協助。本研究之完成，感謝碩士生陳羿綺同學、郭聖偉同學、江閔霏女士，參與文物攝影、標本測繪，以及資料整理，也感謝野上建紀博士在澳門博物館進行研究時，悉心協助了標本線圖的測繪工作。

### 【參考書目】

- 川口洋平，《世界航路へ誘う港市・長崎・平戸》，東京：新泉社，2007年。
- 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註，《澳門記略校註》，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 西田宏子，明磁の西方輸出，收於《世界陶瓷全集14明》，東京：小學館，1993年，頁293-304。
- 西田弘子、出川哲朗，《中國の陶磁・第十卷・明末清初の民窯》，東京：平凡社，1997年。
- 佐々木花江，インド・ゴアで出土した肥前製染付芙蓉手皿，收於《世界に輸出された肥前磁器》，九州：九州近世陶磁學會，2010年，頁253-258。
-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出島和蘭商館跡 - 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荘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年。
- 宋良璧、鄭炳權，澳門是中國外銷瓷的集散地，收於《中國陶瓷研究》第五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頁77-80。
-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
- 余家棟，《江西陶瓷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 何振良、林德民，《中國古代名瓷鑑賞大系——磁灶窑瓷》，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2年。
- 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東京都：東京都歴史文化財産、東京都教育文化財産、朝日新聞社，1996年。
-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
- 韋慶遠，清初的海禁、邊界與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4期，2002年，頁11-32。
- 馬錦強，從澳門收集的瓷片看中國出口瓷，《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4期，2010年，頁143-162。
-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1月。
- 張燮（明），《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傅宋良、王上，邵武四都青雲窑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1988年1期，頁19-22。
-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
- 湯開建，康熙初年的澳門邊界及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清檔《刑部殘題本》研究，《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4期，1998年，頁73-85。
- 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東海平潭碗礁一號出水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 塞亞布拉，強權、社會及貿易——澳門和菲律賓的歷史關係（16-18世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51期，2004年，頁23-32。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鄭氏史料三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
- 劉朝暉，澳門發現的克拉克瓷，收於《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2010年，頁14-32。
- 澳門日報編輯部，明清陶瓷碎片三千件市民捐贈澳門博物館，《澳門日報》，1996年6月20日。
- 澳門雜誌編輯部，澳門博物館將展近古史文物三千明清瓷器崗頂出土文物始末，《澳門雜誌》，第3期，1997年12月，頁6-11。
- 謝明良，熟蘭遮城遺址出土的馬約利卡錫釉陶，《故宮文物月刊》，第285期，2006年，頁87-95。
- 謝明良，熟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十九世紀磁器，《故宮文物月刊》，第293期，2007年，頁80-93。
-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未出版）。
- 盧泰康，從臺灣與海外出土的貿易瓷看明末清初中國陶瓷的外銷，《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外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2年，頁236-252。
- 薛啟善，マカオの肥前陶磁，收於《世界に輸出された肥前磁器》，九州：九州近世陶磁學會，2010年，頁76-85。
- 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 Brigadier, Sara R. *The Artifact Assemblage from The Pepper Wreck: An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Portuguese East-Indiaman that wrecked in the Tagus River*, (Texas A&M University, MA thesis, 2002).
- Brown, Roxanna M. & Sten Sjostr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 (Kul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Museums & Antiquities, 2001).
- Canepa, Teresa. "The Portuguese and Spanish Trade in Kraak Porcelain in the Lat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o. 73 (2008-2009), 2009, pp. 61-78.
- Castro, Filipe Vieira de. *The pepper wreck: A Portuguese Indiaman at the mouth of the Tagus River*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Diana Cargo*, (Cornelis Schuytstraat,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1995).
- Desroches, Jean Paul. Maria Antonia Pinto de Matos & Museum of Anastácio Gonçalves (Lisbon) eds.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 (Lisbon, London: Philip Wilson,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Museus, and Wappingers' Falls, N.Y.: Distributed by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1996).
- Desroches, Jean-Paul, Gabriel Casal & Franck Goddio, ed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 1996).
- Goddio, Franck.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A 16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Switzerland: World Wide First, 1988).
- Gray, Basil. "A Chinese Blue and White Bowl with Western Emblems,"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XXII, 1960, pp. 81-83.
- Harrison, Barbara. *Swatow in Het Princessehof* (Leeuwarden, The Netherlands: Gemeentelijk Museum Het Princessehof, 1979).
- Harrison-Hall, Jessica. *Catalogue of Late Yuan and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 Jörg, Christiaan J. A. &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UK: Sun Tree Publishing, 2001).
- Krahl, Regina.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II*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 1986).
- Lion-Goldschmidt, Daisy. "Ming Porcelains in the Santos Palace Collection, Lisb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o. 49 (1984-85), 1986, pp. 79-93.
- Lion-Goldschmidt, Daisy.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XXXIX, 1984, pp. 3-72.
- Marken, Mitchell W. *Pottery from Spanish Shipwrecks 1500-1800*,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4).
- Pijl-Ketel, C.L. van der. *The Ce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ouw' (1613)* (Amsterdam: Rijkmuseum, 1982).
- Porten, Edward P. Von Der. *Early Wanli Porcelains from the 1576 Manila Galleon San Felipe* (San Francisco, 2009).
- Porten, Edward P. Von Der.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I*, No. 2, 2001, pp. 57-61.
- Rinaldi, Maura.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Ltd., 1989).
- Santos, Paulo Cesar. "The Chinese Porcelain of Santa Clara-a-Velha, Coimbra: Fragment of a Collection," *Oriental Art*, Vol. XLIX, No. 3, 2003/4, pp. 24-31.
- Sassoon, Hamo. "Ceramics from the wreck of a Portuguese ship at Mombasa, Azani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Vol. XVI, 1981, pp. 97-130.
-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Limited, 1988).
- Sjostrand, Sten & Sharipah Lok Lok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2007).
- Vinhais, Luísa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the Rise of a Global Trade in the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ies* (London: Jorge Welsh, 2008).